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解析

王 雪 何广文

摘要:中国县域特别是贫困县域现存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能否发挥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作用,这既是事关银行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实施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2010~2017年1927个县(市、旗)的银行网点分布数据,考察2006年确立的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所带来的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层检验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竞争对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影响,探讨不同类型银行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银行在县域的战略布局已由收缩转为扩张,但贫困县的银行网点数量仍明显少于非贫困县;县域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服务深化,但这种促进效应在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贫困县较弱;根植于贫困县本土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两类县域法人金融机构能显著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效应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均不显著。

关键词: 县域银行网点分布 银行业竞争 贫困县 非贫困县 普惠金融服务深化

中图分类号: F832.35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随着中国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和实施,经历了多年改革的银行主导的县域金融机构体系是否能有效支撑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目标的实现,就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县域特别是贫困县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服务深化是中国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和薄弱环节,2015年底中国政府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将农户、小微企业等诸多县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多元信息传递视角下互联网金融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及对策优化(项目编号:7160325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形成机制及其风险治理研究(项目编号:7187301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普惠金融视角下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目标偏离与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473009)”的资助。本文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的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何广文。

域弱势群体列为中国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对象。相比城市，中国县域特别是贫困县的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依然较低，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微企业受到金融排斥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王定祥等，2011；何广文等，2018）。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以来，特别是2006年实施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以来，银行主导的县域金融机构体系已发生深刻变化，国有银行控制下的行政垄断和农村信用社主导下的市场垄断相继被打破，以农村商业银行^①、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为主，其他银行参与的多元化、竞争性银行业金融体系逐步形成。构建县域多元银行竞争格局的改革目标在于，通过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实现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服务的延伸和深化。那么，县域现存的银行竞争性市场结构表现究竟如何？贫困县和非贫困县是否存在差异？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竞争是否均有效促进了普惠金融服务深化？哪些银行具备更强的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对这些问题的解析，不仅能够从县域银行业市场结构变迁的角度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而且能够对县域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优化提供实践依据。

银行业竞争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不仅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而且吸引了学界的大量深入探讨。目前，学界形成了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银行竞争效率论（例如 Beck et al., 2004; Leon, 2015）和基于信息经济理论的银行竞争关系论（例如 Petersen and Rajan, 1995; Ogura, 2010）两种对立观点。然而，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结合产业组织理论和信息经济理论解析银行竞争效应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县域存量金融机构体系的独特性。银行竞争效率论的主要观点是竞争提升效率，显然，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一个合理逻辑是放宽农村地区市场准入→增加县域银行机构数量→促进金融市场竞争→深化金融服务。银行竞争关系论则认为竞争会阻碍银行“软信息”投资，破坏关系借贷，但是，这一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否成立取决于已有金融市场结构和存量金融机构特征（Presbitero and Zazzaro, 2011）。在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前，中国县域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垄断性金融市场结构特征决定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不仅不会破坏农村信用社关系借贷，而且还会激励农村信用社与本地信贷需求主体建立长期紧密联系。因为竞争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将资源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Presbitero and Zazzaro, 2011），而农村信用社的“小规模、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在于关系借贷技术（Stein, 2002），这意味着，竞争将激励农村信用社在本土市场加大投资“软信息”、与本土信贷需求主体建立更为紧密的长期关系。策略性地增加“软信息”和关系借贷投资通常是在位小规模银行应对外来银行竞争的战略选择（Dell’Ariccia and Marquez, 2004）。可见，县域银行业竞争并不必然破坏关系借贷，甚或有利于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效率的改进，进而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形成有效支撑。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利用2010~2017年1927个县（市、旗）的银行网点分布数据，考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市场结构，实证检验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竞争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型银行作用的差异。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旨在克服因县域经济发展

^①农村商业银行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在内，下同。

水平和金融基础设施条件差异而可能引起的研究结论不一致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 Sarma (2015) 提出的基于距离的普惠金融指数构建方法, 从银行机构渗透性、银行服务可得性和服务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构建中国县域普惠金融指数。该方法可有效避免普惠金融各个维度的“完全可替代性”问题, 并已被墨西哥政府用于观测本国的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1) 普惠金融指数构建方法。基于距离的普惠金融指数(以下简称“IFI 指数”)的构建方法是, 假设普惠金融包括 n 个维度, d_i 表示某地区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在第 i 维的得分, 其具体形式为:

$$d_i = w_i \frac{A_i - m_i}{M_i - m_i} \quad (1)$$

(1) 式中, w_i 为维度 i 被赋予的权重, $0 \leq w_i \leq 1$; A_i 为维度 i 的实际值; m_i 为维度 i 的下限, 取值为 0; M_i 为维度 i 的上限, 取值为该维度第 90 个百分位数。

(1) 式可确保 $0 \leq d_i \leq 1$, d_i 越大, 表明一个地区在第 i 维的普惠金融服务水平越高。一个地区各个维度的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将由 n 维空间上的点 $X = (d_1, d_2, \dots, d_n)$ 表示。在 n 维空间中, 点 $O = (0, 0, \dots, 0)$ 表示最差的点; 点 $W = (w_1, w_2, \dots, w_n)$ 则表示 n 个维度的实际值均达到上限时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最高的点。基于距离的 IFI 即为 X 与 O 之间的欧氏距离(X_1)和 X 与 W 之间的逆欧氏距离(X_2)的平均值, 通过对 O 和 W 之间的距离进行标准化处理, 可使 IFI 的取值介于 0 到 1 之间。 X_1 、 X_2 和 IFI 的表达式为:

$$X_1 = \frac{\sqrt{d_1^2 + d_2^2 + \dots + d_n^2}}{\sqrt{w_1^2 + w_2^2 + \dots + w_n^2}} \quad (2)$$

$$X_2 = 1 - \frac{\sqrt{(w_1 - d_1)^2 + (w_2 - d_2)^2 + \dots + (w_n - d_n)^2}}{\sqrt{w_1^2 + w_2^2 + \dots + w_n^2}} \quad (3)$$

$$IFI = \frac{1}{2} [X_1 + X_2] \quad (4)$$

(2) 指标体系。本文从银行机构渗透性、银行服务可得性和服务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诸多研究使用了这三个维度(例如 Chakravarty and Pal, 2013; 张珩等, 2017; 张栋浩、尹志超, 2018)。具体指标采用 Beck et al. (2007) 提出的衡量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的宏观汇总指标(见表 1), 通过与微观数据对比的方式进行了有效性检验, 结果表明这 6 项指标能够近似代表微观层面的家庭和企业的金融服务获得水平, 能有效衡量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表 1 县域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银行机构渗透性 A_1 $A_1=(a_1+b_1)/2$	地理分支机构渗透率 (a_1) 人口分支机构渗透率 (b_1)	百平方公里营业网点数 (个/百平方公里) 万人银行营业网点数 (个/万人)
银行服务可得性 A_2 $A_2=(a_2+b_2)/2$	人均储蓄存款 (a_2) 人均贷款余额 (b_2)	千人储蓄存款额 (万元/千人) 千人贷款额 (万元/千人)
服务使用效用性 A_3 $A_3=(a_3+b_3)/2$	储蓄率 (a_3) 贷款率 (b_3)	储蓄存款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贷款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关键解释变量。(1) 县域银行竞争度。借鉴诸多文献基于银行网点分布构建全国和城市地区银行竞争度指数的普遍做法 (例如 Benfratello et al., 2008; Chong et al., 2013), 本文利用银行在县及县以下网点分布数据构造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以下简称“*HHI* 指数”) 和前两大银行集中度指数 (以下简称“*CR2* 指数”) 衡量银行竞争度。基于银行网点分布构建的银行竞争度指数隐含了所有银行网点同效率假设, 为此, 本文对基于网点分布构建的银行竞争度指数与基于贷款份额构建的银行竞争度指数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①, 证明了本文银行竞争度指数的稳健性。

HHI 指数的计算方式为加总县域内各类银行网点数量份额的平方; *CR2* 指数为前两大银行网点数量总和占县域内所有银行网点数量总和的比重。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本文也使用 *CR3* 指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中, *HHI* 指数和 *CR2* 指数的表达式为:

$$HHI = \sum_{j=1}^{N_i} (branch_{ji} / \sum_{j=1}^{N_i} branch_{ji})^2 \quad (5)$$

$$CR2 = \sum_{j=1}^n (branch_{ji}) / \sum_{j=1}^{N_i} branch_{ji} \quad (6)$$

(5) 式与 (6) 式中, $branch_{ji}$ 为第 j 家银行在县域 i 内的网点数量, N_i 是县域 i 内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量。*CR2* 指数中 $n=2$, 代表县域 i 内网点数量最多的前两大银行, 相应地, *CR1*、*CR3*、*CR5* 指数中 n 分别取 1、3 和 5。*HHI* 指数和 *CR2* 指数的取值介于 0 到 1 之间, 取值越小表示银行业市场结构越分散, 银行竞争度越强。

(2) 不同类型银行的贡献份额。本文借鉴 Chong et al. (2013) 的定义方法考察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对 *HHI* 指数的贡献份额, 四类银行贡献份额的表达式分别为:

$$sh_rcb = \sum_{r=1}^{R_i} (branch_{ri} / \sum_{j=1}^{N_i} branch_{ji})^2 / HHI \quad (7)$$

$$sh_vb = \sum_{v=1}^{V_i} (branch_{vi} / \sum_{j=1}^{N_i} branch_{ji})^2 / HHI \quad (8)$$

^①限于篇幅, 这里未报告相关分析结果,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sh_state = \sum_{s=1}^{S_i} (branch_{si} / \sum_{j=1}^{N_i} branch_{ji})^2 / HHI \quad (9)$$

$$sh_psb = \sum_{p=1}^{P_i} (branch_{pi} / \sum_{j=1}^{N_i} branch_{ji})^2 / HHI \quad (10)$$

(7) ~ (10) 式中, sh_rcb 、 sh_vb 、 sh_state 和 sh_psb 分别表示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①、邮政储蓄银行对 HHI 指数的贡献份额。 $branch_{ri}$ 代表第 r 家农村商业银行在县域 i 内的网点数量, $branch_{vi}$ 代表第 v 家村镇银行在县域 i 内的网点数量, $branch_{si}$ 代表第 s 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 i 内的网点数量, $branch_{pi}$ 代表第 p 家邮政储蓄银行在县域 i 内的网点数量, R_i 、 V_i 、 S_i 、 P_i 分别代表县域 i 内有 R_i 家农村商业银行、 V_i 家村镇银行、 S_i 家国有商业银行、 P_i ($P_i=1$) 家邮政储蓄银行。

3. 工具变量。为避免因遗漏变量和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借鉴 Chong et al. (2013) 和张杰等 (2017) 构建城市地区银行业竞争工具变量的方式, 本文将样本县所处地级市内地区生产总值与样本县最接近的三个其他县的 HHI 指数的平均值作为样本县银行业竞争 HHI 指数的工具变量。

4.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县域金融环境特征、基础设施特征、经济特征、人口特征, 这些均已被证实与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显著相关。金融环境特征和基础设施特征包括财政支出规模、信用环境和基础设施 (例如张正平、杨丹丹, 2017); 经济特征包括经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人均消费水平、投资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 (例如 Owen and Pereira, 2018); 人口特征包括人口密度和受教育程度 (例如董晓林、徐虹, 2012; Kumar, 2013)。具体变量和相关定义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变量赋值及单位	均值	标准差
HHI	HHI 指数	县域内各类银行网点数量所占份额的平方之和	0.366	0.107
$CR2$	$CR2$ 指数	县域内前两大银行网点数量与县域网点总数的比	0.755	0.102
sh_rcb	农村商业银行贡献份额	农村商业银行对 HHI 指数的贡献份额	0.750	0.158
sh_vb	村镇银行贡献份额	村镇银行对 HHI 指数的贡献份额	0.002	0.007
sh_state	国有五大商业银行贡献份额	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对 HHI 指数的贡献份额	0.065	0.074
sh_psb	邮政储蓄银行贡献份额	邮政储蓄银行对 HHI 指数的贡献份额	0.179	0.128
$fsgdp$	财政支出规模	县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0.266	0.227
$credit$	信用环境	县所在地级市的信用环境指数	0.700	0.032
tel	基础设施	县固定电话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	0.128	0.087

^①国有五大商业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

<i>gdp</i>	县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14.449	18.390
<i>pgdp</i>	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万元/人	3.095	3.266
<i>firstgdp</i>	农业总产值占比	县农业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0.209	0.108
<i>thirdgdp</i>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县第三产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0.345	0.117
<i>pretail</i>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人	0.847	0.714
<i>investgdp</i>	投资率	县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0.823	0.446
<i>agritech</i>	农业现代化水平	县每百元农业产值消耗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千瓦特	0.024	0.016
<i>density</i>	人口密度	单位：百人/平方公里	3.099	2.750
<i>edu</i>	教育水平	县中小學生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	0.117	0.031

注：县地区生产总值、县人均生产总值、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实证模型中取自然对数；信用环境为2012~2015年《中国城市信用环境指数蓝皮书》公布的2010~2015年各地级市信用环境指数。

(二) 模型设定

1. 县域银行业竞争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影响。为了检验中国农村地区放宽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带来的县域银行业竞争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基本模型：

$$IFI_{it} = \beta comp_{it} + \theta K_{it} + \alph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1)$$

(11) 式中， i 和 t 分别表示县域和年份。 α_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差异， γ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IFI_{it} 为测算出的各县级区域的普惠金融指数； $comp_{it}$ 为银行竞争度，使用 HHI 指数衡量； K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2. 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为考察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四类银行对县域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影响差异，本文设定了如下基本模型：

$$IFI_{it} = \beta sh_bank_{it} + \sigma sh_bank_{it} \times comp_{it} + \theta K_{it} + \alph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2)$$

(12) 式中， $comp_{it}$ 为银行竞争度，使用 HHI 指数衡量； sh_bank_{it} 为农村商业银行贡献份额 sh_rcb 、村镇银行贡献份额 sh_vb 、国有五大商业银行贡献份额 sh_state 和邮政储蓄银行贡献份额 sh_psb 的代理变量，用于考察不同类型银行对县域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 sh_bank_{it} 和 $comp_{it}$ 的交叉项用于考察银行业竞争是否能够增强各类银行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

(三)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两部分：一是银行网点分布的相关数据。根据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银监会”）发布的全国金融机构金融许可证信息和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已退出金融机构的相关信息，本文整理了2010~2017年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网点分布数据。二是测算普惠金融指数及县域经济特征的相关数据。本文使用县域层面汇总数据测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5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经整理的银行网点分布信息；

信用环境的相关数据来自 2012~2015 年《中国城市信用环境指数蓝皮书》，其中包括 2010~2015 年各地级市信用环境指数数据，有数据缺失的城市由邻近城市信用环境指数平均值代替。银行业竞争态势统计分析使用了 2010~2017 年全国 1927^①个县（市、旗）的银行网点分布数据。由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最新数据为 2015 年数据，剔除有数据缺失的县（市、旗），最终使用 1733 个县（市、旗）2010~2015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贫困县 509 个，非贫困县 1224 个。为避免奇异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县域经济特征的连续变量进行了 1% 的缩尾处理。

三、县域银行业竞争特征解析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改革，在存量金融机构转型和增量结构调整的交互作用下，推动了县域银行业市场结构由行政垄断阶段、市场垄断阶段向市场竞争阶段的全面转化。诸多研究探讨了行政垄断阶段和市场垄断阶段的县域银行业市场结构（例如何广文，2004；周立等，2016），然而，鲜有文献运用最新数据提供市场竞争阶段的全国性经验证据。本文利用 2010~2017 年全国 1927 个县（市、旗）的银行网点分布数据，分析县域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

（一）网点数量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均由收缩转向扩张

全国县及县以下地区银行网点数量平均值趋势图（如图 1）显示：2010~2017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县域表现出扩张态势，网点数量持续增加；结合 2010 年之前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网点的经验证据，可知县域银行网点数量实现了由负增长向正增长的结构转折。考虑到银行网点分布非对称性和极端值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使用了中位数衡量，这种态势仍然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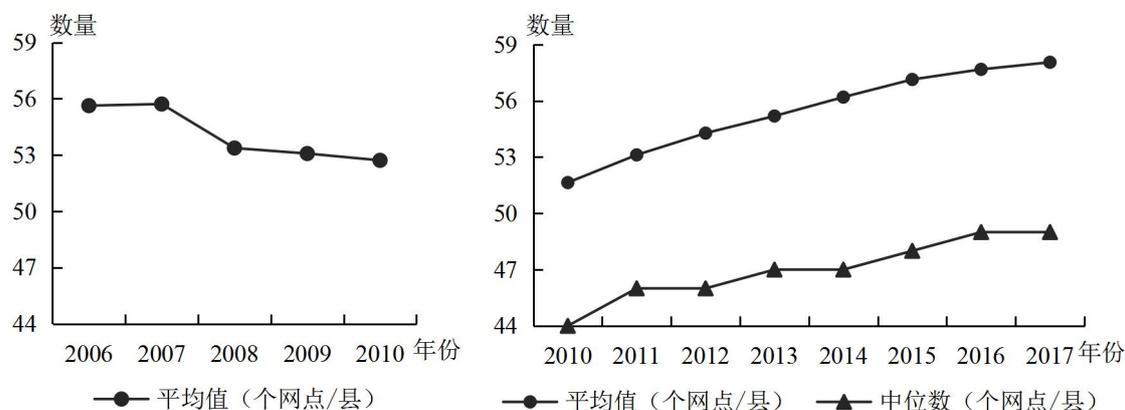


图 1 2006~2017 年全国县及县以下地区银行网点数量变化

注：左图 2006~2010 年数据是根据周立等（2016）中的资料整理得出；右图 2010~2017 年数据是根据原银监会全国银行业金融许可证信息数据整理得到。左图周立等（2016）的数据根据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整理，左右两图数据均由原银监会发布，具备可比性；左右两图中银行网点数量平均值在 2010 年的差异是因所包括的县级行政区数量不同所致，右图采纳了最新的 2015 年全国行政区划标准，该差异不影响总体趋势。

^①本文按照 2015 年行政区划标准确定县级行政区范围，全国共计 1927 个县（市、旗）。

值得思考的是，2006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后，县域银行网点数量的负增长趋势并未立即改变，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农村信用社统一县市法人主体，按照商业化原则撤并了诸多基层网点（何广文，2004）。2010~2017年，县域银行网点数量转为正增长主要是由于增量结构调整效应。在2006年和2007年出台鼓励设立村镇银行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放宽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县域的准入限制等政策后，村镇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积极布局县域网点。杨军等（2016）对2011~2014年江苏省的分析结果也显示这一时期县域银行网点数量逐年增多。

受经济状况、政府干预等因素影响，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演进过程可能具有非同步性。具体来看，2010~2017年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网点数量均呈扩张态势，但贫困县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低于非贫困县。与2010年相比，到2017年贫困县县均增加了3.98个网点，而非贫困县县均增加了7.79个网点（如表3所示）。其中，村镇银行网点增长速度大于国有五大商业银行。2010~2017年，贫困县村镇银行网点数量累计增加了670个，增长了11.67倍，县均村镇银行网点数量增加了1.05个；非贫困县村镇银行网点数量累计增加了2617个，增长了9.67倍，县均村镇银行网点数量增加了2.03个。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分别增加了185个和1173个网点，分别增长了4.72%和6.20%。

有研究指出，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并未扭转银行业的地理排斥，银行在县域的撤并现象仍在继续，2010年之前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论断（周立等，2016）。然而，2010~2017年，县域银行网点数量呈正增长态势，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撤并现象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根据原银监会公布的全国银行业金融许可证信息，2015年末至2017年末银行网点退出数量为3622个，其中，县域银行网点退出数量仅为300余个。

（二）银行网点分布呈空间非均质分布，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网点数量与分布结构均存在差异

表3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的结构差异分析。从总量上看，2017年贫困县银行网点的数量仅为非贫困县的57.99%，2010年贫困县银行网点的数量为非贫困县的58.89%。从分布结构来看，农村商业银行无论在贫困县还是非贫困县都是主力军，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势力范围不同。在贫困县，邮政储蓄银行是仅次于农村商业银行的第二大金融服务提供主体；而在非贫困县，国有五大商业银行是仅次于农村商业银行的第二大金融服务提供主体。此外，村镇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非贫困县的网点数量远多于在贫困县的网点数量，原银监会于2009年开始推行的村镇银行“准入挂钩”^①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村镇银行在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网点布局不平衡的问题（王修华等，2010）。印度中央银行在1977~1990年也实施了“准入挂钩”政策，银行网点空白区和银行网点覆盖区按4:1准入挂钩，这期间银行网点空白区新增网点数量占全国新增网点总数的80%，而1990年以后，这一占比降为0（Burgess and

^①2009年原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中规定村镇银行主发起人要按照“东西挂钩、城乡挂钩、发达与欠发达挂钩”的准入政策选择拟设村镇银行地点。2011年原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调整村镇银行组建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了村镇银行“准入挂钩”政策。

Pande, 2005), 政策停止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银行网点布局不平衡态势再次呈现。

表3 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的分布结构 单位: 个网点/县

县域	年份	所有银行	农村商业 银行	国有五大 商业银行	邮政储蓄 银行	村镇银行	其他商业 银行
贫困县	2010	35.21	20.17	6.15	8.04	0.09	0.15
	2011	36.28	20.51	6.25	8.54	0.17	0.20
	2012	36.80	20.54	6.39	8.75	0.25	0.26
	2013	37.29	20.66	6.44	8.85	0.38	0.34
	2014	37.87	20.82	6.44	8.91	0.55	0.52
	2015	38.39	20.94	6.43	8.93	0.76	0.71
	2016	38.82	20.98	6.42	8.91	0.93	0.95
	2017	39.19	21.03	6.44	8.90	1.14	1.05
非贫困县	2010	59.79	29.13	14.67	13.82	0.21	1.16
	2011	61.48	29.39	15.09	14.39	0.43	1.37
	2012	62.98	29.49	15.52	14.81	0.66	1.67
	2013	64.12	29.60	15.68	14.98	0.98	2.06
	2014	65.38	29.75	15.70	15.03	1.35	2.72
	2015	66.56	29.88	15.71	15.05	1.69	3.39
	2016	67.18	29.87	15.65	14.99	2.00	3.84
	2017	67.58	29.85	15.58	14.94	2.24	4.14

注: 本文中非贫困县的数量为 1289 个; 贫困县数量为 638 个, 包括 569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西藏的 69 个贫困县。全国共 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其中包括 23 个市辖区, 本文的贫困县样本中不包括 23 个市辖区。所有银行网点数量既包括所有商业银行网点数量, 也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外资银行网点数量。农村商业银行网点数量中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网点数量; 其他商业银行为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三) 银行竞争度存在空间差异, 贫困县的银行竞争度低于非贫困县

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改革措施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产生了不同的政策效应。表 4 展示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银行竞争度。无论是贫困县还是非贫困县, *HHI* 指数和 *CR1* ~ *CR5* 指数在 2010~2017 年均逐渐下降, 这表明县域银行业空间竞争加剧。但是, 各项指标也显示, 2010~2017 年贫困县的银行竞争度均低于非贫困县。鉴于此, 本文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银行竞争度差异进行了单变量分析, 表 5 的 *t* 检验结果表明, 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 *HHI* 指数和 *CR1* ~ *CR5* 指数均存在显著差异。可以看出, 相比非贫困县, 贫困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布更加集中, 竞争度较低。黄惠春、褚保金 (2011) 对江苏 2000~2009 年县域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度的分析结果也显示, 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使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苏南和苏北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度均得到提升, 但苏南的市场竞争度明显高于苏北。

表4 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金融机构空间竞争

年份	贫困县				非贫困县			
	<i>HHI</i> 指数	<i>CR1</i> 指数	<i>CR2</i> 指数	<i>CR5</i> 指数	<i>HHI</i> 指数	<i>CR1</i> 指数	<i>CR2</i> 指数	<i>CR5</i> 指数
2010	0.50	0.64	0.85	0.98	0.36	0.51	0.74	0.95
2011	0.49	0.63	0.84	0.98	0.35	0.50	0.74	0.94
2012	0.48	0.63	0.84	0.98	0.34	0.50	0.73	0.94
2013	0.48	0.62	0.84	0.98	0.33	0.49	0.72	0.93
2014	0.47	0.62	0.83	0.97	0.33	0.48	0.72	0.92
2015	0.47	0.62	0.83	0.97	0.32	0.48	0.71	0.91
2016	0.46	0.61	0.82	0.97	0.32	0.48	0.70	0.91
2017	0.45	0.61	0.81	0.96	0.31	0.47	0.70	0.90

注：*HHI* 指数、*CR1* 指数、*CR2* 指数和 *CR5* 指数用以表示银行集中度，取值越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布越分散、竞争度越强；*CR3* 指数和 *CR4* 指数表现出相同的变化态势，限于篇幅未予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表5 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竞争度差异分析

	观测值	<i>HHI</i> 指数	<i>CR1</i> 指数	<i>CR2</i> 指数	<i>CR5</i> 指数
贫困县银行竞争度	5104	0.475	0.623	0.832	0.974
非贫困县银行竞争度	10312	0.332	0.489	0.720	0.926
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竞争度差异	—	0.143***	0.134***	0.112***	0.048***

注：统计期间为2010~2017年；*、**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CR3* 指数和 *CR4* 指数衡量的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竞争度差异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未予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四、县域银行业竞争影响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实证分析

(一) 县域银行业竞争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

本文对全部县样本、贫困县样本和非贫困县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为避免因遗漏变量和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加入工具变量的2SL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具有合理性，表6中2SLS模型的Anderson 检验和Cragg-Donald 检验结果表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1. 县域银行业竞争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均得到验证。表6中被解释变量为 *IFI* 指数，(1) 列、(3) 列和 (5) 列为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2) 列、(4) 列和 (6) 列为2SLS模型回归结果。全部县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HHI* 指数在1%的水平上有显著负向影响，即 *HHI* 指数越小，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布越分散，银行竞争度越强，越有利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表6(3)~(6)列分别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子样本的回归结果，*HHI* 指数也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由此可知，多元化、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有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贫困县也是如此。

2. 县域银行业竞争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在贫困县较弱。需要注意的是, 表 6 (3) ~ (6) 列的固定效应模型和 2SLS 模型的回归结果均显示, 贫困县 *HHI* 指数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小于非贫困县, 这表明银行业竞争对贫困县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较弱。已有研究表明, 在征信体系不健全的欠发达地区, 银行业竞争可能破坏微型金融的动态激励、弱化声誉效应 (Armendáriz and Morduch, 2010)。Mcintosh et al. (2005) 关于乌干达的案例研究显示, 银行业市场竞争甚至导致偿还率和储蓄率下降。中国贫困县的经济活跃度较低, 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和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等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较差, 放宽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所带来的银行业市场竞争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也相对较弱。

表 6 县域银行业竞争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影响

	全部县样本		贫困县样本		非贫困县样本	
	(1)	(2)	(3)	(4)	(5)	(6)
<i>HHI</i>	-0.218*** (0.033)	-0.263*** (0.049)	-0.084** (0.040)	-0.116* (0.053)	-0.308*** (0.043)	-0.382*** (0.064)
<i>fsgdp</i>	0.050*** (0.010)	0.051*** (0.007)	0.031** (0.012)	0.031*** (0.011)	0.055*** (0.013)	0.056*** (0.010)
<i>credit</i>	-0.001 (0.032)	-0.003 (0.027)	0.008 (0.049)	0.009 (0.043)	-0.018 (0.039)	-0.024 (0.033)
<i>tel</i>	0.019** (0.009)	0.020** (0.008)	0.014 (0.015)	0.014 (0.013)	0.022* (0.011)	0.024** (0.010)
<i>ln gdp</i>	-0.181*** (0.022)	-0.181*** (0.015)	-0.267*** (0.030)	-0.266*** (0.025)	-0.155*** (0.026)	-0.153*** (0.018)
<i>ln pgdp</i>	0.098*** (0.020)	0.098*** (0.014)	0.151*** (0.029)	0.150*** (0.025)	0.087*** (0.024)	0.087*** (0.017)
<i>firstgdp</i>	0.063** (0.026)	0.066*** (0.021)	0.029 (0.031)	0.030 (0.025)	0.103*** (0.038)	0.108*** (0.030)
<i>thirdgdp</i>	-0.004 (0.010)	-0.004 (0.008)	0.002 (0.017)	0.002 (0.012)	-0.008 (0.012)	-0.009 (0.009)
<i>ln pretail</i>	0.010* (0.005)	0.010** (0.004)	0.007 (0.008)	0.008 (0.007)	0.010 (0.007)	0.011** (0.005)
<i>investgdp</i>	0.006** (0.002)	0.006*** (0.002)	0.002 (0.004)	0.002 (0.003)	0.009*** (0.003)	0.009*** (0.003)
<i>agritech</i>	0.088 (0.124)	0.103 (0.093)	0.296 (0.207)	0.301* (0.161)	0.027 (0.146)	0.054 (0.109)
<i>density</i>	0.010*** (0.003)	0.010*** (0.002)	0.007 (0.009)	0.006 (0.007)	0.011*** (0.003)	0.011*** (0.002)
<i>edu</i>	0.134*** (0.042)	0.132*** (0.031)	0.030 (0.065)	0.031 (0.046)	0.152*** (0.054)	0.145*** (0.040)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0398	10398	3054	3054	7344	7344
县的个数	1733	1733	509	509	1224	1224
R ²	0.750	0.750	0.766	0.766	0.751	0.750
Anderson检验	—	0.000	—	0.000	—	0.000
Cragg-Donald检验	—	2365.700	—	915.293	—	1344.821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Anderson检验（P值）和Cragg-Donald检验（F值）分别为2SLS模型中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二）不同类型银行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影响差异

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后，县域金融服务供给主体逐渐多元化，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逐步形成。为检验不同类型银行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以及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是否增强了各类银行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本文加入了各银行市场贡献份额及其与 HHI 指数的交叉项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7。表7中被解释变量为 IFI 指数，（1）列、（3）列和（5）列为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2）列、（4）列和（6）列为2SLS模型回归结果。

1.根植于贫困县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有效促进了普惠金融服务深化，但村镇银行未在非贫困县显现出优势。从农村商业银行来看，表7中（1）~（6）列对全部县样本、贫困县样本和非贫困县样本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2SLS模型的回归结果均显示， sh_rcb 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农村商业银行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均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服务深化。 sh_rcb 与 HHI 指数的交叉项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银行竞争度越高，农村商业银行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越大。农村商业银行通常根植于县域层面且规模较小，根据“小银行优势”理论，与客户的地理距离近、机构内部组织层级少、业务决策链条短的小银行具备处理“软信息”、建立关系借贷的优势。在竞争性金融市场中，关系借贷更能表现出减少信贷配给、降低交易成本的普惠效应。

从村镇银行来看，贫困县样本回归中，（3）列固定效应模型和（4）列工具变量2SLS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sh_vb 有显著正向影响；非贫困县样本回归中，（5）列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sh_vb 的影响不显著，而（6）列2SLS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sh_vb 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小于贫困县样本的估计结果。这表明，相比于设立在非贫困县的村镇银行，设立在贫困县的村镇银行在促进当地普惠金融服务深化方面更具优势。非贫困县样本回归中，（5）列、（6）列的回归结果均显示， sh_vb 与 HHI 指数的交叉项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在银行竞争度较强的非贫困县，村镇银行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并未得到增强。这进一步验证了村镇银行在市场竞争度较低的贫困县能发挥比较优势，而在市场竞争度较高的非贫困县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可能的原因是，在市场竞争度较低的贫困县中，存在诸多没有充分享受到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即存在较大增量业务空间，设立在贫困县的村镇银行利用本地小银行的“软信息”优势，更容易与本地尚未获得金融服务的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微企业等建立长久的借贷关系，从而扩展增量业务。而在市场竞争度较高的非贫困县，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较多，既有农村商业银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

邮政储蓄银行等传统银行，也有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诸多县域新型银行，增量业务空间相对较小，且相比于上述银行，村镇银行在经营规模、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劣势。

2.国有五大商业银行与邮政储蓄银行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作用有限。表7(1)~(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sh_state 以及 sh_state 与 HHI 指数的交叉项均无显著影响，表明国有五大商业银行的县域分支机构对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并无显著影响，银行业市场竞争压力也未能对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的普惠金融服务产生影响。从规模角度来看，具有高长型科层结构的大型商业银行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均不具备比较优势，它们在处理主要依靠“软信息”的农村金融业务时表现出Stein(2002)提出的“组织不经济”问题。以国有五大商业银行中在县域分支机构最多的中国农业银行为例，虽然中国农业银行于2008年成立了三农金融事业部，但其县域贷款的审批权限仍停留在与业务一线距离较远的省级和地市级层面(曹雷,2016)，因而未能从根本上克服业务流程过长的“大银行模式”弊端。从产权角度来看，Beck et al.(2008)对58个国家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国有银行主导的银行业体系会带来更严重的存款排斥、贷款排斥和支付排斥。

从邮政储蓄银行来看，贫困县样本的回归中，(3)列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sh_psb 有显著正向影响， sh_psb 和 HHI 指数的交叉项有显著负向影响，但(4)列2SLS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sh_psb 、 sh_psb 和 HHI 指数的交叉项的影响均不显著。(1)列、(2)列全部县样本回归结果和(5)列、(6)列非贫困县样本的回归结果均显示， sh_psb 、 sh_psb 和 HHI 指数的交叉项均有显著影响。这表明邮政储蓄银行仅在非贫困县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银行业市场竞争显著地增强了它的促进效应。可能的原因是，邮政储蓄银行是全国范围经营的银行，虽然它的全部网点中有60%分布在县域，但是，它在非贫困县的网点数量比在贫困县的网点数量多约70%，可以看出它的战略布局明显偏好非贫困县；同时，邮政储蓄银行也并未克服业务流程长、处理“软信息”不经济等“大银行模式”弊端，而相比于在非贫困县，在经济欠发达、资本积累少和金融配套设施不完善的贫困县，银行开展农村金融业务更加依靠“软信息”。

表7 县域不同类型银行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影响

	全部县样本		贫困县样本		非贫困县样本	
	(1)	(2)	(3)	(4)	(5)	(6)
sh_rcb	0.136*** (0.032)	0.176*** (0.039)	0.098* (0.055)	0.128** (0.056)	0.185*** (0.037)	0.264*** (0.048)
$sh_rcb \times HHI$	-0.242*** (0.038)	-0.310*** (0.061)	-0.109** (0.045)	-0.149** (0.064)	-0.369*** (0.051)	-0.517*** (0.081)
sh_vb	0.901 (0.576)	1.413*** (0.498)	3.126* (1.695)	3.781* (2.026)	0.536 (0.707)	1.315* (0.683)
$sh_vb \times HHI$	-0.834 (1.950)	-2.984 (1.915)	-7.719* (4.560)	-9.656 (5.912)	0.801 (2.693)	-2.698 (2.928)
sh_state	0.073 (0.126)	-0.144 (0.146)	-0.119 (0.241)	-0.353 (0.289)	0.120 (0.151)	-0.160 (0.274)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服务深化

<i>sh_state</i> × <i>HHI</i>	-0.806 (0.532)	0.017 (0.542)	-0.151 (0.595)	0.407 (0.574)	-1.036 (0.684)	0.122 (1.124)
<i>sh_psb</i>	0.354*** (0.085)	0.294*** (0.092)	0.207* (0.117)	0.162 (0.122)	0.380*** (0.100)	0.305** (0.125)
<i>sh_psb</i> × <i>HHI</i>	-1.051*** (0.241)	-0.859*** (0.267)	-0.608* (0.332)	-0.483 (0.338)	-1.141*** (0.286)	-0.888** (0.382)

注：括号内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各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①和动态效应问题。在银行业竞争影响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模型中，本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以便尽可能地削弱遗漏解释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同时，本文将样本县所处地级市内地区生产总值与样本县最为接近的三个其他县的 *HHI* 指数的平均值作为样本县 *HHI* 指数的工具变量，采用 2SLS 模型进行了回归，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即便如此，考虑到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可能存在的粘性特征，即某一县（市、旗）前期的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可能会影响当期的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本文引入了 *IFI* 指数的滞后一阶项 *L.IFI*，并采用两阶段系统 GMM 再次进行回归。其中，*IFI* 指数的二阶滞后项和 *HHI* 指数的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人口密度、信用环境和年份虚拟变量被视为外生变量，其他变量被视为内生变量。表 8 的回归结果中，被解释变量为 *IFI* 指数，（1）～（3）列中全部县样本、贫困县样本和非贫困县样本的 *HHI* 指数均有显著负向影响，与上文的结果一致。

表 8 县域银行竞争对普惠金融深化影响的系统 GMM 检验

	全部县样本	贫困县样本	非贫困县样本
	(1)	(2)	(3)
<i>L.IFI</i>	0.723*** (0.065)	0.710*** (0.107)	0.836*** (0.059)
<i>HHI</i>	-0.440*** (0.093)	-0.449*** (0.116)	-0.310** (0.130)
AR (1)	0.000	0.000	0.000
AR (2)	0.208	0.244	0.199
Hansen检验	0.052	0.061	0.322

注：AR (1) 和 AR (2) 分别表示差分残差项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的 p 值；Hansen 检验 (P 值) 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括号内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2.银行业竞争的不同度量方式。为确保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本文将样本县所处地级市内地区生产总值与样本县最为接近的三个其他县的 *CR2* 指数的平均值作为样本县 *CR2* 指数的工具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分析。表 9 中被解释变量为 *IFI* 指数，（1）列、（3）列和（5）列为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2）列、（4）列和（6）列为加入工具变量的 2SLS 模型的回归结果，（1）～（6）

列的CR2指数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县域银行业竞争能够显著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

表9 基于CR2指数的稳健性检验

	全部县样本		贫困县样本		非贫困县样本	
	(1)	(2)	(3)	(4)	(5)	(6)
CR2	-0.266*** (0.040)	-0.274*** (0.059)	-0.138** (0.060)	-0.177** (0.089)	-0.302*** (0.047)	-0.300*** (0.075)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0398	10398	3054	3054	7344	7344
县的个数	1733	1733	509	509	1224	1224
R ²	0.753	0.753	0.767	0.767	0.752	0.752
Anderson检验	—	0.000	—	0.000	—	0.000
Cragg-Donald检验	—	1646.478	—	585.888	—	969.322

注：Anderson 检验（P 值）和 Cragg-Donald 检验（F 值）表明构建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括号内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基于 CR3 指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也与上文结果一致。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历多年改革后中国县域现有的多元化、竞争性银行业市场结构究竟能否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是本文致力于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 2010~2017 年各类银行在县域的网点分布数据，本文系统地考察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及其演化，在构建县域层面银行竞争度指标和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 2SLS 模型，解析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银行业竞争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影响，并考察了县域不同类型银行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影响差异。

经过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 银行业在县域的战略布局已由收缩转变为扩张，多元机构竞争逐步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形态。但是，银行业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分布呈现非均质性。2017 年贫困县银行网点数量仅为非贫困县的 57.99%，且这一差距与 2010 年相比未见缩小；在贫困县，网点数量最多的前两大银行类型为农村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而在非贫困县则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村镇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县域新型银行均偏好非贫困县，而选择性地将贫困县排斥在外。村镇银行的“准入挂钩”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县域网点布局不平衡的态势。

(2) 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后，银行业市场竞争显著促进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普惠金融服务深化，但对贫困县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较弱。在金融基础设施较差的贫困县，尤其是在征信体系不完善的贫困地区，银行业竞争促进金融服务效率提升的作用可能被弱化。

(3) 分布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不同类型银行对普惠金融服务深化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第一，根植于贫困县本土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两类小规模银行对当地的普惠金融服务深化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村镇银行在非贫困县没有显现出优势。第二，国有五大商业银行的县域分支

机构对县域普惠金融服务深化没有显著作用，县域银行业市场竞争也并未对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的普惠金融服务产生影响。第三，作为主要服务于县域的全国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仅在非贫困县对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有显著影响，且县域银行竞争度越高，影响越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启示可能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注重发挥县域银行业市场竞争在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逐步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构建多元化、竞争性的县域银行业市场结构，是中国政府为促进普惠金融服务深化进行的有益探索，可为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中国经验”。

(2) 重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银行网点布局不平衡问题，重点推进贫困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应继续重点在贫困县推进构建竞争性、多元化银行业市场，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贫困县普惠金融服务深化。与此同时，为确保银行业市场竞争效率，应加快完善贫困县银行业市场改革的配套金融基础设施。例如加快推进贫困县农户和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农村产权抵押配套措施，完善互联网金融配套设施。

(3) 重点推进贫困县普惠金融发展，注重发挥县域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本文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根植于贫困县本地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在深化当地普惠金融服务方面具备优势，然而，现实情况是诸多贫困县农村信用社改制进程落后于非贫困县，农村信用社治理效率低下，村镇银行又多设立在非贫困县。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推动贫困县农村信用社改制，促进其采纳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进一步提升其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对村镇银行布局贫困地区的政策引导，并重视政策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 1.曹雷，2016：《新时期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效果评估：基于总体的视角》，《农业经济问题》第1期。
- 2.董晓林、徐虹，2012：《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的视角》，《金融研究》第9期。
- 3.何广文，2004：《中国农村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 4.何广文、何婧、郭沛，2018：《再议农户信贷需求及其信贷可得性》，《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 5.黄惠春、褚保金，2011：《我国县域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度研究——基于降低市场准入条件下江苏37个县域的经验数据》，《金融研究》第8期。
- 6.王定祥、田庆刚、李伶俐、王小华，2011：《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与信贷行为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5期。
- 7.王修华、贺小金、何婧，2010：《村镇银行发展的制度约束及优化设计》，《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
- 8.杨军、张龙耀、马倩倩、黄馨谊，2016：《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江苏省52个县域数据》，《农业经济问题》第11期。
- 9.张栋浩、尹志超，2018：《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 10.张杰、郑文平、新夫，2017：《中国的银行管制放松、结构性竞争和企业创新》，《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
- 11.张正平、杨丹丹，2017：《市场竞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与普惠金融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与

比较》，《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12.张珩、罗剑朝、郝一帆，2017：《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107家农村信用社全机构数据的经验考察》，《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13.周立、李萌、陈莎、潘素梅，2016：《金融排斥、金融排异与农村金融普惠》，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4.Armendáriz, B., and J. Morduch, 2010, *The Economics of Microfina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5.Beck, T., A. Demirgüç-Kunt, and V. Maksimovic, 2004, “Bank Competition and Access to Financ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6(3): 627-648.

16.Beck, T., A. Demirgüç-Kunt, and M. S. Peria, 2007, “Reaching out: Access to and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Across Countr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5(1): 234-266.

17.Beck, T., A. Demirgüç-Kunt, and M. S. Peria, 2008, “Banking Services for Everyone? Barriers to Bank Access and Use around the World”,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2(3): 397-430.

18.Benfratello, L., F. Schiantarelli, and A. Sembenelli, 2008, “Banks and Innovation: Microeconomic Evidence on Italian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0(2): 197-217.

19.Burgess, R., and R. Pande, 2005, “Do Rural Bank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3):780-795.

20.Chakravarty, S. R., and R. Pal, 2013, “Financial Inclusion in India: An Axiomat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5(5): 813-837.

21.Chong, T. T., L. Lu, and S. Ongena, 2013, “Does Banking Competition Alleviate or Worsen Credit Constraints Faced b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7(9): 3412-3424.

22.Dell'Ariccia, G., and R. Marquez, 2004, “Information and Bank Credit Alloc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2(1): 185-214.

23.Kumar, N., 2013,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Evidence from Indi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 Policy*, 5(1): 4-19.

24.Leon, F., 2015, “Does Bank Competition Alleviate Credit Constrai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57: 130-142.

25.Mcintosh, C., A. D. Janvry, and E. Sadoulet, 2005, “How Rising Competition Among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Affects Incumbent Lenders”, *Economic Journal*, 115(506): 987-1004.

26.Ogura, Y., 2010, “Interbank Competition and Information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the Interest Rate Differ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9(2): 279-304.

27.Owen, A. L., and J. Pereira, 2018, “Bank Concentration,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Review of Development Finance*, 8(1): 1-17.

28.Petersen, M. A., and R. G. Rajan, 1995, “The Effect of Credit Market Competition on Lending Relationship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2): 407-443.

29.Presbitero, A. F., and A. Zazzaro, 2011, “Competition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Friends or Foe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3): 387-413.

30.Sarma, M., 2015, “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 *Economics Bulletin*, 35(1): 604-611.

31.Stein, J. C., 2002,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llocation: Decentralized versus Hierarchical Firms”, *Journal of Finance*, 57(5): 1891-1921.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董 翀)

The Banking Competition and Deepening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 Rural China: A Stratified Analysis Between Poor and Non-poor Counties

Wang Xue He Guangwen

Abstract: Whether the existing banking institutional system in China's counties, especially in poor counties, can play a role in develop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not only is a major issue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 of bank-dominated rural financial system, but also a core issu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data of bank outlets in 1927 counties from 2010 to 2017,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banking market structure in poor and non-poor counties since the relaxation of banking access policy in rural areas in 2006. It examines the impact of banking competition in poor and non-poor countie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by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It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bank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banks in counties have started to expanding branches, but the number of banking networks in poor counties is still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non-poor counties. Poor counties have far less village and township banks, joint-stock banks and other “new-type” ones than non-poor counties. Secondly, the county-level banking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deepening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but the effect is weaker in poor counties with imperfect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Thirdly, rural commercial banks and village and township banks, which are small-sized and rooted in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have stro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 capabilities. Larg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have no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in neither poor counties nor non-poor ones. The above findings support continuous relaxation policies on business expansion of banks and raise the issue of financial inequality between poor and non-poor counties. Meanwhile, the study also suggests taking advantage of small banks rooted in local areas and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in poor counties.

Key Words: Outlet Distribution; Banking Competition; Poor County; Non-poor County; Financial Inclusion